

§ 历史学研究 §

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信仰变迁与造像的重生

董华锋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要: 通过分析四川地区唐代的菩提瑞像和中晚唐至两宋时期的毗卢遮那造像及其所反映出来的两种信仰的发展状况, 我们认为: 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103龕等两尊造像由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的变化, 一方面反映了两种信仰的变迁和更替, 另一方面, 对于两尊名称发生变化的菩提瑞像来说, 他们在毗卢遮那信仰兴起时代的装彩中获得了重生。信仰的变迁与造像的变化有时会有一定的时间差。

关键词: 菩提瑞像; 毗卢遮那; 信仰变迁; 造像重生

中图分类号: K879.3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0766 (2013) 04-0075-06

四川地区唐代摩崖造像中有一批头戴宝冠、颈戴项圈、右臂饰臂钏、左手仰掌置于腹前、右手抚膝、结跏趺坐的佛像。随着考古调查的深入, 这类造像的实例越来越多, 学术界的研究也在不断地深入。但是, 对于这类造像的定名, 一直以来存在争议。有的学者认为是毗卢遮那(即大日如来)像,^①有的学者认为是佛顶佛,^②不过, 目前较多的学者认为是菩提瑞像。^③对于引起菩提瑞像还是毗卢遮那之争的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103龕等两尊造像, 一直以来, 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李玉珉先生根据大足北山佛湾第12龕的造像配置提出, 之所以引起这种争议是由于菩提瑞像与华严思想相结合的缘故,^④这种说法对笔者很有启发。本文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努力以一种新的视角解释四川地区这两尊从菩提瑞像变化为毗卢遮那的造像。

一、唐代四川的菩提瑞像

唐代四川地区菩提瑞像信仰十分兴盛。根据前贤调查刊布的资料, 结合笔者实地考察, 将四川地区菩提瑞像的基本状况简表如下:

序号	窟龕号	宝冠/螺髻	项圈	台座形式	菩提双树	靠背(六擎具)	题记(年代和造像名称)	资料来源
1	蒲江飞仙阁第60龕	宝冠	无	长方形座	无	无	永昌元年(689)……瑞像	雷《试论》
2	蒲江飞仙阁第9龕	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武周)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篇》图54, ^⑤ 第58页

作者简介: 董华锋(1982—), 男, 山西昔阳人,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

基金项目: 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巴蜀唐宋净土类经变的调查与研究”(skqy201238)

① 邢军 《广元千佛崖初唐密教造像试析》, 《文物》1990年第6期; 丁明夷 《川北石窟札记》, 《文物》1990年第6期; 常青 《试论龙门初唐密教雕刻》, 《考古学报》2001年第3期。

② 吕建福 《中国密教史》,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5年, 第198页。

③ 雷玉华 《试论四川的“菩提瑞像”》, 《四川文物》2004年第1期, 表内简称“雷《试论》”; 雷玉华、王剑平 《再论四川的菩提瑞像》,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6期, 表内简称“雷《再论》”。

④ 李玉珉 《四川菩提瑞像窟龕研究》, 重庆大足石刻艺术博物馆编 《2005年重庆大足石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7年, 第555-557页。表内简称“李玉珉”。

⑤ 中国美术全集编委会 《中国美术全集·雕塑编》十二,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年。

3	蒲江鸡公树山漏米石第 15 龕			束腰长方形座		有	大中五年 (851)	雷《试论》
4	蒲江佛尔湾第 27 号龕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残		同上
5	邛崃石笋山第 26 龕	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大历三年 (768) “石笋山菩提、释迦像龕铭”	同上
6	广元千佛崖莲花洞	螺髻饰宝珠	有	长方形座	无	无	(武周)	《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 8 卷, 图 18, ^① 第 18 页
7	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	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景云至延和元年 (710—712) 菩提瑞像	同上, 图 22, 第 22 页
8	巴中南龕第 37 龕	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盛唐)	《总录》, ^② 第 61—63 页
9	巴中南龕第 103 龕	宝冠	有	仰莲台	无	无	乾符四年 (877)	同上, 第 157—159 页
10	巴中北龕第 12 龕	?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盛唐)	《巴中石窟》, ^③ 第 251 页
11	巴中西龕第 44 龕	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盛唐)	《总录》, 第 289—291 页
12	巴中西龕第 73 龕	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无	无	(盛唐)	同上, 第 314—315 页
13	巴中西龕第 87 龕	螺髻, 头上二飞天托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无	(盛唐)	同上, 第 323—326 页
14	巴中石门第 12 龕	宝冠	无	仰莲座	无	无	(盛唐)	同上, 第 354—356 页
15	安岳安堂寺龕	宝冠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李玉珉, 第 555—557 页
16	安岳玄妙观第 6 龕	头残	有	仰莲座	无	有	(盛唐)	雷《再论》; 笔者考察
17	安岳卧佛院第 62 龕	头残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唐后期)	雷《研究》, ^④ 第 217 页
18	大足北山佛湾第 12 龕	螺髻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无	有	(唐末)	雷《试论》
19	乐至马锣堰佛寺第 26 龕	宝冠(残)	有	长方形座	不明	有	菩提龕铭 (盛唐)	雷《研究》, 第 217—218 页
20	潼南千佛寺第 30 龕	头残	有	束腰长方形座	有	有		笔者考察

上表所列前 19 例造像已在各类著作中揭示。如前贤所述, 这 19 例造像在形象上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 大部分头戴宝冠, 颈戴项圈, 左手手掌置于腹前, 右手抚膝盖, 靠背上雕有摩羯鱼、童子骑兽、大鹏等六擎具。这种一致性符合瑞像的基本特征。在这 19 例造像中有 5 例有明确的题记, 从题记中看, 这种造像被称为“瑞像”、“菩提”或“菩提瑞像”, 而且其形象亦与《大唐西域记》所述释迦降魔成道像一致,^⑤ 因而, 正如各位前贤所言, 将这种造像称为菩提瑞像是合理的。

① 刘长久主编《中国石窟雕塑全集》第 8 卷《四川、重庆》,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9 年。

② 四川省文物管理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巴州区文物管理所编《巴中石窟内容总录》, 成都: 巴蜀书社, 2006 年, 在表内简称《总录》。

③ 程崇勋《巴中石窟》,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年, 第 250—252 页。

④ 雷玉华《巴中石窟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1 年, 在表内简称“雷《研究》”。

⑤ 季羨林, 等《大唐西域记校注·摩揭陀国上》, 北京: 中华书局, 2000 年, 第 675 页。

上表所列的第20例造像，即潼南千佛寺第30龕造像，是笔者2011年9月考察所见。潼南千佛寺摩崖造像系2011年8月当地民众采石施工中发现，位于重庆市潼南县崇龕镇薛家村，重庆市文物考古所工作人员接报后立即前往现场勘探，并对其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此龕内正壁设低坛，上雕一坐佛二弟子二菩萨，坛下雕二力士（已残），坐佛头残，但宝冠及缯带残迹清晰可见，着坦右肩袈裟，颈戴项圈，身后靠背饰摩羯鱼、童子骑兽、大鹏等六擎具，双手均残，但从残迹看，左手应为仰掌置于腹前，右手应抚膝，结跏趺坐于束腰长方形座上，身后雕菩提双树。总的来看，潼南千佛寺第30龕造像在形象上具备前19例造像的基本特征，因而，我们以为此造像亦为一尊菩提瑞像。这是川渝地区第20例菩提瑞像。此龕菩提瑞像有二弟子、二菩萨、二力士配置左右，从造像组合上来看与蒲江飞仙阁第9龕等龕相似，应属于前期菩提瑞像（7世纪末至8世纪）。另外，此龕左侧开一同时代的外方内拱形龕，龕内主尊为一结跏趺坐弥勒佛。这种做法与邛崃石笋山第26号菩提瑞像龕及其旁开的第28号弥勒龕情况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20例造像中的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龕第103龕曾被后世妆彩，并留有装彩记。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北壁东侧近窟口处有一方唐碑，碑额作《大唐利州刺史毕公柏堂寺菩提瑞像赞并序》。据罗世平先生考证，窟内造像系唐睿宗景云至延和年间（710—712）利州刺史毕重华镌刻的菩提瑞像。但在五代前蜀乾德六年（924）时，此碑中部被磨平，重刻了装彩记：“府主相公宅越国夫人四十二娘，奉为大王国夫人重修装毗卢遮那佛壹龕并诸菩萨及部从音乐等全已装严成就，伏愿行住吉祥，诸佛卫护，设斋表赞讫，永为供养。乾德六年十月十五日白。”^①巴中南龕第103龕^②内龕左壁外侧下方阴刻了唐乾符四年（887）题记。在内龕左右两侧壁和外龕右侧壁现存6条后代的修缮或妆彩题记，我们把其中提及主尊神格的三条抄录如下：1. 内龕左壁内侧修缮、装彩题记“净清奉佛于乙卯年四月吉日修理佛阁，又于戊午年四月重装毗卢佛金刚合堂圣像。弟子金雁龙黄□□门婿徐鸣及余民□。”2. 内龕右壁中部阴刻修缮、装彩记“净清发心弟子余辛二人奉佛于乙卯年四月吉日修理佛阁，又于戊午年四月吉日重装毗卢佛金刚□□圣像。延龄弟子辛世华侄男辛瑞真岳氏孙男辛免辛同辛奇。”3. 内龕右壁内侧下方阴刻清道光七年（1848）装彩记“是毗卢佛也，先年无会。自道光七年四月八日会末等解囊以权子母令将历年所积会装彩金身暨正殿文昌帝君穿衣，共用钱四十余千，此特小善耳，何足录哉？抑为后日之乐善者，劝是为序。在会朱颜芳率孙佐龙，李永全率子芳泰；在会徐象元率子维焯，李毓疑率子永理，雒文思率孙国映，李芳达率子鸿思；绘土陈其珠，僧启率徒续成。大清道光二十八年秋九月吉日。”

如前所述，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内所造之像毫无疑问是菩提瑞像，巴中南龕第103龕正壁主尊头戴宝冠、颈戴项圈、着右袒式袈裟，左手仰掌置于胸前，右手施降魔印，无疑也是一尊菩提瑞像。但是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中五代前蜀乾德六年的装彩记和巴中南龕第103龕中戊午年、清道光二十八年等三条装彩记却不约而同地将主尊称为毗卢遮那。这四条题记是相当一部分学者将此类造像定名为毗卢遮那佛的重要依据。

二、四川地区中晚唐至两宋时期的毗卢遮那佛

唐高宗永徽四五年间（653—654），中天竺高僧阿地瞿多译出了《陀罗尼集经》，其卷一记载了佛顶像的形象：

其作像法，于七宝华上结加趺坐，其华座底戴二师子，其二师子坐莲华上，其佛右手者，伸臂仰掌当右脚膝上，指头垂下到于华上，其左手者，屈臂仰掌向脐下横着。其佛左右两手臂上，各着三个七宝瓔珞，其佛颈中亦着七宝瓔珞，其佛头顶上作七宝天冠，其佛身形作真金色，被赤袈裟。^③

① 广元市文物管理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所佛教室《广元千佛崖石窟调查记》，《文物》1990年第6期。

② 此龕的具体情况参见《巴中石窟内容总录》，第157—159页。

③ 阿地瞿多译《陀罗尼集经》卷一，《大正藏》第18册，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影印），1983年，第785页。

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开元三大士之一、中天竺高僧善无畏到达长安,译出《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一卷,记载毗卢遮那佛的形象如下:

(摩诃毗卢遮那如来)身色如月,首戴五佛冠,以妙纱谷天衣璎珞庄严其身,光明普照十方法界,皆倚于月轮,……虽佛顶尊胜心真言,皆是大日如来三身真言也。由此当知,尊胜佛顶者,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身,即是三部佛顶身。^①

这一记载,明确告诉我们,所谓佛顶佛,“即是毗卢遮那如来身”。从这两条记载看,毗卢遮那像的基本特征是:头戴宝冠、璎珞庄严其身。《陀罗尼集经》记载的形象与前揭的20例菩提瑞像十分类似。

中晚唐以后,四川与长安之间的佛教交往频繁。剑南(一作成都)惟上(一作“惟尚”)就曾在长安青龙寺从唐代密宗大师惠果处亲受二部阿闍梨灌顶,^②惟上学成后在成都一带弘传密法。此外,四川与敦煌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紧密:1944年四川大学修筑校内自荷花池自锦江边的道路时在一座晚唐墓中发现一件陀罗尼经咒印本,印本右侧有汉文题记一行“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近卞□□印卖咒本□□□……”,冯汉骥先生根据墓葬出土器物 and 此陀罗尼经咒印本的相关情况,推定其年代是唐末,并联系斯坦因在藏经洞劫走的一件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经咒(斯坦因编号 ch. xlili. 004)认为:藏经洞出土的许多雕版印刷品可能是在成都印刷的。^③事实上,敦煌藏经洞中确实发现了中和二年(882)版《剑南西川成都府樊赏家历》、四川过家本天复二年(902)版《金刚经》等来自成都的印刷品。因而,晚唐之后的四川地区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影响,密教逐渐兴起。^④此时出现了四川密教史上祖师式的重要人物——柳居直(柳本尊),他于晚唐光启二年(886)在嘉州开始炼指行化并传金刚界大轮五部法,后晋天福二年(937)在广汉建大轮院,后晋天福五年(940)在成都玉津坊建道场。

实际上,中晚唐之后,随着密教在四川地区的发展,出现了毗卢遮那佛像。合川城北濮岩寺石窟现存一窟七尊造像,是唐合州刺史刘温长庆三年(823)开凿的。据陈明光先生考察,此窟主尊头戴宝冠、有圆形头光、颈戴项圈、双手于胸前结智拳印、靠背饰摩羯鱼、童子骑兽、大鹏等六擎具,结跏趺坐于方形束腰仰莲座上。宋嘉定二年(1209)张庆宗装彩记中重新申明此造像为毗卢佛。^⑤此毗卢遮那佛的形象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唐咸通十二年(871)舍利宝函顶部中央的毗卢遮那佛除台座略有差别外,^⑥其余均十分相类。另,据范成大《成都古寺名笔记》记载,长庆三年之后的唐敬宗宝历年间(825—826),寓居成都的画家赵公祐曾在成都文殊阁画过毗卢遮那佛“文殊阁四壁……阿弥陀佛、大悲、毗卢、十大弟子四堵……并待诏赵公祐笔,神格上品。”^⑦据画史记载,五代前蜀时,杜子环、杜龄龟也曾画过毗卢遮那佛“杜子环者,成都人也。……王蜀时,于龙华泉东禅院画毗卢佛,据红日轮、乘碧莲花座。”^⑧“鲜于院小阁上壁,画毗卢佛,待诏杜龄龟笔。妙格下品。”^⑨黄修复《益州名画录》还对杜子环绘制的毗卢遮那佛做了较为详细的描述“据红日轮、乘碧莲花座。”也就是有头光、坐莲花座。这一形象与合川濮岩寺及法门寺地宫舍利宝函顶部中央的毗卢遮那佛亦较为相似。

① 善无畏译《佛顶尊胜心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三身佛果三种悉地真言仪轨》,《大正藏》第18册,第913页。

② 空海撰《大唐神都青龙寺故三朝国师灌顶阿闍梨惠果和尚之碑》、吴殷撰《大唐神都青龙寺东塔院灌顶国师惠果阿闍梨行状》,见吕建福《中国密教史》,第693、696页。

③ 冯汉骥《记唐印本陀罗尼经咒的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5期。

④ 霍巍《青藏高原东麓吐蕃时期佛教摩崖造像的发现与研究》,《考古学报》2011年第3期。

⑤ 陈明光《菩萨装施降魔印佛造像的流变——兼谈密教大日如来尊像的演变》,《敦煌研究》2004年第5期。

⑥ 韩伟《法门寺唐代金剛界曼陀罗成身会造像宝函考释》,《文物》1992年第8期。

⑦ 王卫明《大圣慈寺画史丛考:唐五代宋时期西蜀佛教美术发展探源》,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第258页。

⑧ 黄修复《益州名画录》卷中,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年,第44页。

⑨ 王卫明《大圣慈寺画史丛考:唐五代宋时期西蜀佛教美术发展探源》,第242页。

到两宋时期，尤其是南宋淳熙年间赵智凤在大足宝顶山重振柳本尊教法，四川地区毗卢遮那信仰大为兴盛。北宋元祐三年（1088）大足石篆山第7窟、安岳毗卢洞第8窟、大足宝顶山大佛湾第14窟、大足宝顶山小佛湾第5窟等毗卢遮那造像大量涌现。

《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一指出：

如来智慧日光则不如是，遍一切处作大照明矣，无有内外方所昼夜之别。复次日行阎浮提，一切卉木丛林，随其性分各得增长，世间众务因之得成，如来日光遍照法界，亦能平等开发无量众生种种善根，乃至世间出世间殊胜事业。^①

信仰毗卢遮那佛可使“世间众务因之得成”，这无疑对信众有着极大的诱惑力。那么，四川地区中晚唐之后，尤其是两宋时期，毗卢遮那信仰如此兴盛也就可以理解了。

三、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

如前所述，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103龛由于后世的装彩，均由最初的菩提瑞像而被改称毗卢遮那。这种变化有几点需要注意：

1. 从时间上来看，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被称作毗卢遮那发生在五代前蜀乾德六年（924）。巴中南龛第103龛被称作毗卢佛发生在戊午年，程崇勋先生认为此“戊午年”即乾宁五年（898），^②若此说无误，那么巴中南龛第103龛主尊名称的变化要早于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而且这种变化后的称呼被清代人沿用。因而，可以说，在四川地区，这种将菩提瑞像称作毗卢遮那的现象发生在唐末五代时期。

2. 信仰的变迁。正如前揭20例造像所显示的情况，四川地区发现的有明确纪年的菩提瑞像最早的是蒲江飞仙阁第60龛永昌元年（689）造像，最晚的是巴中南龛第103龛乾符四年（877）年造像。也就是说，菩提瑞像信仰在四川地区始于7世纪后期，盛于8世纪，延续至9世纪末。从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四川地区的毗卢遮那造像始见于9世纪，盛于12世纪，一直延续至13世纪中叶。也就是说，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103龛主尊名称发生变化的9世纪末10世纪初，菩提瑞像信仰衰落，毗卢遮那信仰初兴，是两种信仰变迁的过渡阶段。到后来毗卢遮那信仰勃兴的两宋时期，再无这样的现象发生。

3. 造像的比较。如前所揭，在菩提瑞像信仰后期的长庆三年（823），合川城北濮岩寺就已出现了毗卢遮那佛造像。而此时，对于四川地区的信众来说，毗卢遮那作为一种新兴的信仰是陌生的，其形像自然也很陌生。而在此之前兴盛的菩提瑞像又与毗卢遮那像十分类似，正如下表所示：

	菩提瑞像		毗卢遮那	
	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	《大唐西域记》卷八	合川濮岩寺石窟	《陀罗尼集经》卷一
宝冠	头戴高宝冠	珠瓔宝冠	头戴宝冠	其佛头顶上作七宝天冠
项圈	颈戴项圈，项圈上坠七条串珠	珠瓔宝冠，奇珍交饰	颈戴项圈	其佛颈中亦着七宝瓔珞
臂钏	右臂饰臂钏	珠瓔宝冠，奇珍交饰		其佛左右两手臂上，各着三个七宝瓔珞
坐姿	结跏趺坐，右足在上	结跏趺坐，右足居上	结跏趺坐	结加趺坐
台座	束腰长方形座	座高四尺二寸，广长二尺五寸	方形束腰仰莲座	于七宝华上结加趺坐

实际上，从前表所列的20例造像看，菩提瑞像有头戴宝冠和螺髻（数量很少）两种形象。信众

① 一行《大毗卢遮那成佛经疏》卷一，《大正藏》第39册，第579页。

② 程崇勋《巴中石窟》，第124-125页。

们选取了与毗卢遮那形象更为接近的戴宝冠菩提瑞像进行装彩, 做为一种快捷便利的供养毗卢遮那佛的功德。

结 语

综上所述, 7 世纪后期至 8 世纪, 四川地区菩提瑞像信仰兴盛。9 世纪末 10 世纪初, 菩提瑞像信仰衰落, 毗卢遮那信仰初兴, 但此时四川地区的信众们并不熟悉毗卢遮那的形象, 而文献中记载的毗卢遮那与菩提瑞像又十分类似。因此, 在新旧两种信仰交替的 9 世纪末 10 世纪初, 信众们把最初被称为菩提瑞像的广元千佛崖菩提瑞像窟和巴中南龛第 103 龛的主尊作为毗卢遮那佛进行了装彩。这两窟的主尊造像尊格从菩提瑞像到毗卢遮那的变化, 一方面反映出了信仰的变迁; 另一方面,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这两尊被更改名称的造像在后世的装彩中获得了重生。

从四川地区的菩提瑞像和毗卢遮那的这种变化来看, 中国古代的造像实际, 尤其是世俗化色彩浓厚的中下层人民造像实际中, 信仰和图像之间有时候并不一定会完全地一一对应起来, 信仰的变迁与造像的传承变化有时会有一定的时间差。这或许是我们理解信仰和造像之间的差异的关键。

From Auspicious Bodhi Image to Vairocana: the Faith Change and the Statue Rebirth

Dong Huafe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ichuan U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 610064)

Abstract: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Auspicious Bodhi images of Tang Dynasty in Sichuan area and the Vairocana images from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to the Song Dynasty, and we find that the Auspicious Bodhi image in the Thousand-Buddha-Grotto in Guangyuan changed to Vairocana image in Cave 103 of the South Bazhong Grotto. Analyzing the faith change as revealed in the statues, we think this change on the one hand reflects the transition of two different beliefs, and, on the other hand, these two Auspicious Bodhi images receive a rebirth with the rise of Vairocana faith. Sometimes, the faith changes do not synchronize the update of statues.

Key words: Auspicious Bodhi image, Vairocana, faith change, rebirth of statues

(责任编辑: 黎 原)